

交易生态经济学：数字时代的制度分析新范式

赵恢林¹

(1. 汕头大学, 广东汕头, 515063)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核心工具阐释制度生成逻辑，依托效率标准开展制度评价，推动经济学理论从理想化均衡分析转向真实世界的制度研究。但其根植于微观个体与线性逻辑的分析范式，难以适配网络化、平台化、系统化的现代经济形态，存在明显理论局限：该范式无法区分经济运行中的良性摩擦与恶性摩擦，仅聚焦制度运行效率，忽视制度结构合理性、分配公平性与长期可持续性，能够解释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却难以界定适配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良序制度标准。基于此，本文融合系统科学、整体因果观与网络分析思维，原创性构建交易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本文以交易生态系统为基本分析单元，提出生态交易摩擦成本核心范畴，将其拆解为结构、网络、分配、循环四类系统性耗散成本。研究认为，交易是嵌入多元网络的生态化行为；区别于传统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效率准则，交易生态经济学以生态交易摩擦成本最优化评判制度质量，追求系统健康、结构合理、分配公平与循环顺畅的综合发展目标，为现代制度经济学提供全新的整体主义分析范式。

关键词：交易生态经济学；生态交易摩擦成本；制度质量

一、引言：制度经济学的现代困境与范式突破需求

当代经济体系正在经历由平台化、网络化、系统化、生态化共同驱动的结构转型。市场运行从分散化点对点交易演进为中心化网络化组织形态；生产组织由线性单向产业链，迭代为多主体、多环节、强耦合的共生生态系统；经济决策逻辑从单一主体个体理性最优，转向网络系统协同演化与整体动态均衡；价值评

¹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深度转型时期公共风险的经济影响：理论框架、测度方法和实证研究”（23YGC790197）。

作者简介：赵恢林（1992—），男，湖北黄石人，博士，汕头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量子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通讯邮箱：E-mail: hlzhao@stu.edu.cn。

判目标也突破传统单一效率导向，逐步拓展为**效率、公平、安全、可持续发展与公共利益**并重的多维复合体系。这一系列深层结构性变革，致使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内核的个体主义分析框架，以及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交易中心研究范式，在阐释真实世界经济运行规律时，日益暴露出理论张力与解释边界局限。面对系统性失灵、结构性扭曲、网络型垄断、分配极化分化、跨区域传导性风险等现代典型经济现象，传统新制度经济学的底层分析逻辑逐渐显现出难以逾越的理论瓶颈。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是 20 世纪主流经济学演进进程中最具颠覆性的理论突破之一。科斯（Coase, 1937）以**交易成本**为核心分析切口，突破新古典经济学无摩擦、零成本、完全信息与完全理性的理想化预设，将经济学研究回归到充满交易摩擦、契约约束、制度规制与行为边界的现实经济场景。科斯明确指出，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运行并非无成本，交易全过程所包含的信息搜寻、缔约谈判、契约签订、履约监督、合约执行及纠纷调处等环节，均会消耗真实经济资源，进而形成不可忽视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得以产生并长期存续的核心逻辑，在于以内部行政协调替代部分外部市场交易，通过组织治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

此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5）立足契约不完全性、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假设，夯实了交易成本范式的微观行为基础；诺斯（North, 1990）将交易成本分析范式拓展至国家治理、产权界定、法治建设、意识形态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领域，明确提出制度变迁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因；张五常（Cheung, 1983）进一步泛化交易成本内涵，将其界定为一切“鲁滨逊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社会性成本”，使之成为解析社会结构与制度运行的统一分析标尺。

至此，新制度经济学构建起逻辑自洽、体系完备且学术影响力深远的理论范式：交易成本是解析制度生成、存续与演化的核心钥匙；制度的本质功能在于节约各类社会交易成本；制度运行效率与制度优劣的评判基准，最终取决于交易成本的节约幅度。王振营（2024）进一步指出，制度变迁可被视为推动交易系统演化的重要力量。随着交易复杂度的提升，原有制度可能无法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从而催生新的制度安排。这些研究范式极大拓宽了现代经济学的解释疆域，推动经济学正式迈入“制度分析时代”，也为理解企业组织、私人契约、产权安排、市场秩序与国家治理等各类制度形态，提供了通用且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

然而，随着经济系统日趋复杂、网络联结日趋紧密、结构约束日趋强化，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在局限也日益凸显，并集中表现为四个深层矛盾。

第一，分析单元局限于微观交易，缺乏系统整体视角。新制度经济学以单次、孤立、点状的交易为基本分析单元，将经济系统理解为无数交易的简单加总，忽视交易之间的网络关联、结构约束、生态依赖与反馈循环。现实中，任何交易都不可能脱离系统而独立存在，而是嵌入产业链、供应链、社会信任、文化环境、技术体系与权力结构之中。孤立地分析交易成本，必然难以把握系统失灵、结构扭曲、网络垄断、分配传导等现代经济的核心问题。

第二，将所有摩擦视为同质成本，无法区分良性摩擦与恶性摩擦。交易成本范式将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监管成本、寻租成本、欺诈成本、壁垒成本等不加区分地归入同一概念，默认一切摩擦均具有负面性，均应最小化。但现实中，摩擦具有鲜明的异质性：法治约束、安全监管、信息披露、劳动者保护、反垄断规制等属于良性摩擦，是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正义、防范系统风险的必要条件；而垄断壁垒、权力寻租、信息操纵、过度压榨、分配扭曲等属于恶性摩擦，是制度失灵与系统病态的直接体现。新制度经济学无法在理论上对二者做出严格界分，极易导向效率优先、弱化监管、忽视公平的理论偏向。

第三，以效率为唯一价值标准，无法回应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制度目标。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最小化作为制度优劣的终极判断，本质上是效率至上的单一价值逻辑。但现代国家的制度目标远不止效率，公平正义、经济安全、公共利益、社会稳定、生态可持续、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均是制度质量的内在要求。大量能够增进公平、保障安全、防范风险的制度安排，不仅不会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可能在短期内提高交易成本，但在长期内提升系统韧性与社会整体福祉。在交易成本框架下，这类制度往往被误判为低效，从而产生理论误导与政策偏差。

第四，能够解释制度为何存在，却难以完整判断制度是否优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贡献，在于回答“制度何以可能”，即制度为何出现、为何维持、为何演进。但其理论逻辑难以充分回答“制度何以优良”，即何种制度在结构上更合理、在网络上更协同、在分配上更公平、在循环上更可持续、在价值上更符合公共利益。现实经验反复表明，交易成本低的制度未必是好制度，高度垄断、极度压榨、分配严重失衡的体系往往交易成本极低，但其内在结构病态、利益格局扭曲、系统韧性脆弱，长期不可持续。

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深层张力，呼唤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范式革命。经济学必须从孤立交易走向交易生态，从线性分析走向系统分析，从微观成本走向整体耗散，从效率唯一走向多维最优。

在此背景下，本文正式提出并系统建构**交易生态经济学**，将其确立为独立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兴经济学分支。交易生态经济学也不同于交易经济学，交易经济学是以人类有限理性为基础，考察交易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如何推动经济系统的运行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现象（王振营，2016）。交易生态经济学则以交易生态系统为基本分析单元，以生态交易摩擦成本为原创核心范畴，以系统最优、结构合理、网络协同、分配公平、循环顺畅为制度判断标准，实现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式超越与逻辑升维。本文的学术贡献在于：第一，原创性提出交易生态系统与生态交易摩擦成本两大核心概念，它不预设所有摩擦均为负面，而是严格区分良性摩擦与恶性摩擦，奠定新学科分支的理论基石；第二，系统阐明交易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内涵、基本命题与范式边界，论证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合法性；第三，从方法论、理论逻辑、价值标准、现实应用等层面，全面揭示其对新制度经济学的革命性超越；第四，为理解平台经济、产业链安全、反垄断治理、制度质量评价、高质量发展等重大问题，提供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与前瞻性的分析框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与内在局限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范畴为核心支点，实现了对新古典经济学无摩擦世界假设的重大突破，使经济学真正进入面向真实世界的制度分析阶段。这一范式

不仅成功解释了制度的起源、存在依据与演进逻辑，更将效率判断标准建立在交易成本最小化之上，形成了一套自洽且极具影响力的理论体系。然而，建立在个体交易、线性关系、效率至上基础上的分析逻辑，在面对网络化、平台化、系统化的现代经济结构时，其内在局限日益凸显，难以对制度优劣、系统健康、分配公平与长期可持续性做出完整判断。系统梳理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与边界，是确立交易生态经济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理论前提。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贡献：交易成本与制度存在的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视为无成本、无摩擦、信息完全、理性预期的理想运行系统，制度被当作外生给定前提，交易过程被简化为价格机制下瞬间完成的均衡行为。科斯的革命性贡献，在于打破了这一理想化框架，将**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学核心分析，使经济学从抽象世界回归现实世界。科斯明确指出，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并非免费，交易主体需要搜寻交易对象、谈判交易条件、签订契约、监督履约、处理纠纷，上述环节均消耗真实资源，构成不可忽略的交易成本。企业之所以出现并长期存在，正是因为内部组织协调可以替代部分市场交易，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在科斯奠基之上，威廉姆森从契约不完全性、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出发，进一步夯实了交易成本的微观基础，将其系统运用于企业边界、治理结构、纵向一体化等问题分析；诺斯将交易成本拓展至国家、产权、法治、意识形态与长期经济增长领域，提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张五常等学者则将交易成本定义为“鲁滨逊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一切成本”，使之覆盖社会运行的全部制度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由此形成三大核心命题：交易成本是理解制度的关键；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节约交易成本；制度效率与制度优劣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降低程度。

这一范式的历史贡献毋庸置疑。它使经济学真正进入“制度时代”，为理解企业、契约、产权、市场、国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提供了统一逻辑，推动经济学走向更真实、更具体、更具解释力的发展阶段。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深层局限：四大难以突破的瓶颈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理论成就，但其底层分析逻辑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使其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系统化、网络化、生态化、平台化的结构转型，也难以回应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经济安全等多维制度目标。

第一，分析单元局限于孤立交易，缺乏系统整体视角。新制度经济学以单次、点状、孤立的交易为基本分析单元，将经济系统理解为无数交易的简单加总，忽视交易之间的网络关联、结构约束、生态依赖与反馈循环。现实经济中，任何交易都不可能脱离产业链、供应链、社会信任、技术体系、权力结构与制度环境独立存在。以孤立交易为出发点，必然无法理解系统性风险、结构性垄断、网络外部性、分配传导机制、系统失灵等现代经济的核心问题，其解释力存在天然短板。

第二，将所有摩擦视为同质成本，无法区分良性摩擦与恶性摩擦。交易成本范式将搜寻、谈判、监管、寻租、欺诈、壁垒等所有阻碍交易的因素不加区分地归入同一概念，默认一切摩擦均具有负面性，均应最小化。但现实中，摩擦具有鲜明的异质性：法治约束、安全监管、信息披露、劳动者保护、反垄断规制等属于**良性摩擦**，是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正义、防范系统风险的必要条件；而垄断壁垒、权力寻租、信息操纵、过度压榨、分配扭曲等属于**恶性摩擦**，是制度失灵与系统病态的直接体现。新制度经济学无法在理论上对二者做出严格界分，极易导向效率优先、弱化监管、忽视公平的理论偏向。

第三，以效率为唯一价值标准，无法回应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制度目标。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最小化作为制度优劣的终极判断，本质上是效率至上的单一价值逻辑。但现代国家的制度目标远不止效率，公平正义、经济安全、公共利益、社会稳定、生态可持续、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均是制度质量的内在要求。**大量能够增进公平、保障安全、防范风险的制度安排，不仅不会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可能在短期内提高交易成本，但在长期内提升系统韧性与社会整体福祉。**在交易成本框架下，这类制度往往被误判为低效，从而产生理论误导与政策偏差。

第四，能够解释制度为何存在，却难以完整判断制度是否优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贡献，在于回答“制度何以可能”，即制度为何出现、为何维持、为何演进。但其理论逻辑难以充分回答“制度何以优良”，即何种制度在结构上更合

理、在网络上更协同、在分配上更公平、在循环上更可持续、在价值上更符合公共利益。现实经验反复表明，交易成本低的制度未必是好制度，高度垄断、极度压榨、分配严重失衡的体系往往交易成本极低，但其内在结构病态、利益格局扭曲、系统韧性脆弱，长期不可持续。新制度经济学无法对制度质量做出整体性、结构性、价值性判断，这是其最核心的能力边界。

（三）小结：新制度经济学的能力边界

总体来看，新制度经济学是以**微观交易为基础**、以**效率为导向**的制度理论，其历史贡献巨大，但能力边界清晰：它能够解释**制度的起源**，却无法完整判断**制度的质量**；能够分析**单点交易成本**，却无法把握**系统整体耗散**；能够追求**效率最大化**，却无法实现**制度体系最优化**。这一理论边界，正是交易生态经济学得以提出、建构并确立为独立经济学分支的根本学理依据。

三、交易生态经济学的提出：学科定位与核心内涵

面对现代经济日趋网络化、平台化、生态化的结构特征，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在系统视角、摩擦异质性、价值多维性与制度质量判断上的内在局限，经济学亟需一场从微观交易走向系统生态、从单点成本走向整体耗散、从效率唯一走向多维最优的范式跃迁。交易生态经济学正是在这一理论与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它并非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修补、拓展或应用延伸，而是以全新分析单元、核心范畴与判断标准为支撑，具备独立学理地位的新兴分支。确立其学科定位、阐释其核心内涵、界定其理论基石，是建构完整理论体系的关键一步。

（一）交易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定义

交易生态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建立在对传统制度经济学范式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其核心突破，在于将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单元从**孤立交易**提升至**交易生态系统**，将制度运行的核心度量指标从**交易成本**转向**生态交易摩擦成本**，将制度优劣的判断逻辑从**最小化成本**升级为**最优化生态**。由此，交易生态经济学获得了独立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学科身份与理论品格。

本文对交易生态经济学做出如下严格界定：**交易生态经济学**，是以交易生态系统为基本分析单元，以生态交易摩擦成本为核心度量指标，研究交易系统的主体结构、网络关系、环境约束、价值循环、系统摩擦与演化规律，揭示制度质量的整体性判断标准，并为系统健康、协同高效、分配公平、长期可持续的现代经济运行提供理论基础的独立经济学分支。

这一定义包含三层不可分割的理论规定：第一，交易生态经济学拥有**独立的分析单元**，即交易系统，而非单次、孤立、点状的市场交易；第二，交易生态经济学拥有**独立的核心范畴**，即生态交易摩擦成本，而非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成本；第三，交易生态经济学拥有**独立的判断标准**，即生态交易摩擦成本最优化，而非交易成本最小化。分析单元、核心范畴、判断标准三者共同构成了交易生态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分支的合法性基础，使其从根本上区别于既有的制度经济学范式，并具备解释现代经济复杂运行的系统性能力。

（二）交易生态系统：基本分析单元

交易生态系统是交易生态经济学最底层、最核心的分析对象，它的确立，标志着经济学从个体主义、线性思维迈向整体主义、系统思维。所谓交易系统，是指由交易主体、交易关系、交易环境与价值循环相互嵌入、相互依赖、协同演化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交易不是外生于系统的孤立行为，而是系统自身展开与运行的内在环节。

一个完整且稳定的交易系统，包含四个相互支撑的组成部分：第一，**主体生态**。由个人、企业、平台、政府、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与金融主体等多元行动者构成，不同主体在系统中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信息地位、权力结构与行为模式，共同构成交易发生的组织基础。第二，**网络生态**。由主体之间的竞争、合作、互补、共生、博弈、契约、信任、利益联结与权力关系构成，网络结构的疏密、强弱、均衡与否，直接决定系统的协同效率与利益分配格局。第三，**环境生态**。由产权制度、法治体系、监管框架、信用环境、技术基础设施、信息结构、文化规范与宏观政策等外部条件构成，是交易得以稳定展开的制度与物质前提。第四，**循环生态**。由价值创造、价值交换、价值分配、价值消费、再投资、风险

传导、系统反馈与自我修复构成的完整闭环，循环顺畅与否决定经济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

交易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结构决定系统功能，关系决定交易结果，循环决定长期走向。这一特征，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单次交易为核心的传统分析框架，为理解现代经济系统提供了全新的本体论基础。

（三）生态交易摩擦成本：原创核心基石

生态交易摩擦成本是交易生态经济学的**原创性核心范畴**，也是整个理论体系得以成立的逻辑支点。它在来源、性质、结构、价值含义与制度功能上，均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存在本质区别。

本文对生态交易摩擦成本给出严格学术定义：**生态交易摩擦成本，是交易生态系统在运行、协同、循环与演化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网络性、整体性、循环性阻力、耗散与效率损失的总和，是反映交易生态健康程度、协同顺畅程度、分配公平程度与长期可持续程度的核心度量指标。**

与聚焦于微观、点状、线性、单次交易的交易成本不同，生态交易摩擦成本是**系统层面**的耗散，具有全局性、结构性与内生性。依据其来源与表现形式，可将其划分为四大维度：第一，**结构摩擦**。源于交易生态内部权力结构、垄断结构、准入壁垒、层级关系与制度扭曲，表现为垄断定价、市场壁垒、权力寻租、产业链失衡、平台霸权与资源错配。第二，**网络摩擦**。源于信息传递、社会信任、主体协同与网络联结的不足，表现为信息不对称、信任缺失、协同失灵、沟通阻塞、网络分裂与数据孤岛。第三，**分配摩擦**。源于价值分配机制扭曲、利益格局失衡与系统内部的非对称掠夺，表现为分配不公、强者剥夺弱者、劳动报酬被挤压、两极分化与消费能力不足。第四，**循环摩擦**。源于价值创造、交换、分配、消费闭环不畅与系统自我修复机制失效，表现为产能过剩、增长异化、社会内卷、风险累积与长期不可持续。这四大维度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共同决定交易生态系统的整体质量，也构成制度优劣判断的客观依据。

（四）交易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命题

在分析单元、核心范畴与结构维度确立的基础上，交易生态经济学形成五条具有基石意义的基本命题，构成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骨架：第一，交易以生态方式存在与运行，而非以孤立、点状方式存在，系统约束先于个体决策。第二，**制度质量的核心判据，是生态交易摩擦成本的优化程度，而非简单的最小化。**第三，**摩擦具有异质性，良性摩擦应当保留与强化，恶性摩擦必须降低与消除。**第四，结构健康优先于单点效率，网络协同优先于个体最优，循环顺畅优先于短期收益。第五，高质量制度，是系统健康、结构合理、网络协同、分配公平、循环顺畅的制度。

上述命题，使交易生态经济学既区别于追求成本最小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区别于单纯强调系统复杂的系统理论，形成了兼具严谨性、现实性与价值导向的制度经济学新范式。它不仅能够解释制度“为何存在”，更能够科学判断制度“何以优良”，从而为现代经济治理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四、生态交易摩擦成本：结构、测度逻辑与制度含义

生态交易摩擦成本作为交易生态经济学的原创性核心范畴，其理论价值不仅体现在对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概念的范式超越，更体现在自身具备清晰、严谨、可延展的结构化体系。将生态交易摩擦成本进行维度分解、内在机理阐释与测度逻辑建构，既是完善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理论走向现实应用、制度评价与政策设计的关键环节。本部分在界定生态交易摩擦成本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对其结构构成、生成机理、测度方向与制度含义进行系统展开，为交易生态经济学提供可操作、可检验、可推广的分析工具。

（一）结构摩擦：制度病态的最核心来源

结构摩擦是生态交易摩擦成本中最根本、最稳定、最具决定性的部分，它不随交易技术、信息条件、契约形式的改进而自动消失，而是内生于交易生态的权力结构、层级结构、垄断结构、准入结构与利益分配结构之中。结构摩擦的强弱，直接决定整个交易生态的均衡性、竞争性与健康性。

结构摩擦的本质，是交易生态内部权力配置失衡、资源掌控不均、规则制定权不对称所引发的系统性阻力。在结构摩擦偏高的系统中，少数主体占据核心节点，拥有定价权、分配权与规则制定权，形成对其他主体的持续性支配；市场准入壁垒高企，新主体难以进入，竞争机制被弱化甚至失效；权力与资本相互嵌套，寻租空间广泛存在，资源配置偏离效率方向；产业链上下游、平台与商户、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地位严重失衡，弱势主体长期处于被挤压、被剥削状态。这种结构性失衡不是局部问题，而是系统底层逻辑的扭曲，无法通过技术改进、信息透明、契约优化等局部手段予以根除，只能依靠制度改革、结构优化、反垄断规制与权力制衡机制建设实现根本性缓解。

结构摩擦的存在，从根本上颠覆了新制度经济学仅从交易环节考察成本的狭隘视角。它表明，制度运行的核心矛盾，往往不是交易过程中的搜寻、谈判、监督成本过高，而是结构失衡导致的系统性耗散过大。忽视结构摩擦，就无法真正理解制度质量的核心要义，也无法实现经济系统的长期稳定与高效运行。

（二）网络摩擦：信息与信任的系统耗散

网络摩擦是交易生态在信息传递、信任建构、主体协同、网络联结过程中产生的阻力与耗散，是连接主体生态、环境生态与循环生态的关键纽带。在网络化、平台化、数字化的现代经济中，网络摩擦已逐渐取代传统交易成本，成为制约系统效率的重要因素。

网络摩擦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透明，部分主体利用信息优势操纵交易结果，破坏交易公平性；二是社会信任水平不足，契约执行依赖外部强制，交易预期不稳定，监督成本与违约风险居高不下；三是主体间协同机制缺失，沟通链条过长、协调成本过高，网络整体运行效率低下；四是网络分裂与数据孤岛，平台之间、主体之间、系统之间互联互通不足，资源无法自由流动，价值无法高效传递。

与结构摩擦不同，网络摩擦具有更强的流动性与可塑性，可以通过法治建设、信用体系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数据共享机制构建、监管透明度提升等手段有效缓解。但网络摩擦同样具有系统性特征，它不是单个主体的信息成本问题，

而是整个网络的结构与秩序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将信息问题简单归入交易成本，无法揭示网络摩擦的整体属性与系统效应，而交易生态经济学则将其置于网络生态框架下，实现了从个体信息成本到系统网络摩擦的理论升维。

（三）分配摩擦：价值掠夺与系统失衡

分配摩擦是交易生态内部价值分配机制扭曲、利益格局失衡、强势主体对弱势主体形成系统性掠夺所产生的摩擦与耗散。长期以来，主流制度经济学将分配问题排除在效率分析之外，或将其视为与交易成本无关的次生问题，而交易生态经济学则明确将分配摩擦纳入核心分析框架，使之成为判断制度优劣、系统健康与否的关键维度。

分配摩擦集中表现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不匹配，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持续偏低，资本收益、平台收益、垄断收益过高；产业链与平台内部利益分配严重倾斜，弱势主体缺乏议价能力，被持续抽取租金；两极分化不断扩大，消费能力被削弱，最终形成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并存的矛盾格局。分配摩擦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更直接影响价值循环的顺畅性与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当分配摩擦超过一定阈值，经济系统将出现内需不足、创新乏力、社会内卷、风险累积等一系列病态特征。

从理论上讲，分配摩擦是交易生态权力结构失衡在利益环节的直接体现，是结构摩擦的延伸与结果。它证明，效率与公平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内在统一：缺乏公平的分配机制必然导致严重的分配摩擦，进而破坏系统循环、降低整体效率、危及长期稳定。新制度经济学以效率为唯一标准，无法容纳分配摩擦的理论空间，而交易生态经济学则将分配公平视为系统效率的内在组成部分，实现了效率逻辑与公平逻辑的有机统一。

（四）循环摩擦：增长异化与系统不可持续

循环摩擦是价值创造、价值交换、价值分配、价值消费、再投资、风险出清、系统修复的完整闭环运行不畅所产生的耗散与阻力。循环摩擦是交易生态系统长期演化能力、自我平衡能力、风险抵御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判断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依据。

在循环摩擦偏高的系统中，生产与消费脱节，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长期并存；过度追求短期增长导致社会整体内卷，资源消耗与福利提升脱节；风险无法正常出清，不断累积放大，最终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平衡相背离，形成“有增长无发展”的异化状态。循环摩擦的根源，在于交易生态缺乏自我调节、自我修复、自我平衡的内生机制，结构、网络、分配等多重矛盾在长期运行中不断叠加、传导、放大，最终导致系统功能退化。

将循环摩擦纳入生态交易摩擦成本体系，标志着交易生态经济学从静态效率分析转向动态系统分析，从短期成本收益核算转向长期可持续性判断。它突破了新制度经济学只关注交易瞬间完成、忽视长期演化循环的理论局限，使制度分析真正具备历史维度与长期视角。

（五）生态交易摩擦成本的测度逻辑

生态交易摩擦成本难以完全用货币化指标统一核算，但其内在结构清晰、外在表现可观测，因此可以构建结构化、多维度、可比较的评价体系，为制度质量评估、政策效果检验、发展模式比较提供客观依据（见表1）。

表 1：生态交易摩擦成本维度与测度逻辑

摩擦类型	核心来源	主要表现	测度方向
结构摩擦	权力结构、垄断、壁垒、制度扭曲	垄断定价、准入壁垒、寻租、产业链失衡	垄断程度、壁垒高低、结构均衡度
网络摩擦	信息、信任、协同、联结	信息不对称、信任不足、协同失灵、数据孤岛	信息透明度、信任水平、互联互通程度
分配摩擦	分配机制、利益格局、内部掠夺	收入差距、劳动报酬偏低、两极分化	分配公平度、劳动占比、弱势主体保障
循环摩擦	价值循环不畅、系统修复失效	产能过剩、消费不足、内卷、风险累积	循环顺畅度、产能利用率、内卷程度

这一测度体系不追求单一数值，而是从结构、网络、分配、循环四个维度进行综合判断，既避免了交易成本概念过于笼统、难以精确量化的缺陷，又保持了理论的严谨性与应用的灵活性。

（六）制度含义：从“降成本”到“优生态”

生态交易摩擦成本理论的确立，带来制度逻辑的根本转变。传统制度经济学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目标，倾向于弱化约束、简化程序、放松管制，将一切制度约束都视为成本负担。交易生态经济学则明确提出，**制度设计的核心不是无差别地降低一切摩擦，而是优化摩擦结构、提升系统质量**：降低垄断、寻租、掠夺、壁垒等恶性摩擦；保留并强化法治、监管、公平、安全、信息披露等良性摩擦；优化权力结构与网络结构，提升协同效率；改善分配机制，畅通价值循环；最终实现交易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与长期可持续。

这一转变，标志着制度经济学从“成本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从效率工具主义走向系统治理主义，为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平台治理、反垄断政策、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与行动遵循。

五、交易生态经济学的学科边界、理论支撑与研究方法

一门成熟且具备独立学术地位的经济学分支，必须拥有清晰的学科边界、坚实的理论基础与自成体系的研究方法。交易生态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超越新制度经济学并形成独立范式，不仅在于其提出了原创性核心范畴与分析单元，更在于它能够在经济学谱系中明确自身定位，在多学科交叉中汲取理论养分，在方法论层面实现整体主义与系统思维的统一。本章从学科边界、理论支撑、研究方法三个维度，系统建构交易生态经济学的学术“身份标识”，为其作为独立经济学分支提供更加完整、严谨、规范的学理基础。

（一）学科边界

交易生态经济学在理论渊源上与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系统科学等存在一定交集，但在研究对象、核心问题、基本范畴与分析逻辑上具有严格边界，这种边界性构成其独立存在的重要前提。

第一，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二者是**范式迭代关系**，而非补充延伸关系。新制度经济学以孤立交易为单元、以交易成本为核心、以效率最小化为标准，本质上是微观交易导向的效率理论；交易生态经济学以交易生态系统为单元、以生态交易摩擦成本为核心、以系统最优化为标准，是整体导向、结构导向、长期导向的高质量制度理论。前者回答“制度为何存在”，后者回答“制度何以优良”。

第二，与信息经济学的边界。信息经济学聚焦信息不对称、搜寻成本、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将信息摩擦视为交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仍未脱离个体交易分析框架；交易生态经济学虽然重视信息问题，但将其纳入**网络摩擦**这一系统维度，强调信息结构、网络联结、信任生态、数据互联互通的整体效应，而非单纯的个体信息成本。信息摩擦只是交易生态摩擦的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第三，与产业经济学的边界。产业经济学以产业组织、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经济绩效为主要分析对象，关注垄断、竞争、集中度、进入退出壁垒等问题，仍以市场—企业为基本分析框架；交易生态经济学超越产业与企业边界，将平台、政府、中介、劳动者、消费者等全部纳入**交易系统**，强调主体间关系、网络结构、价值循环、系统韧性与长期演化，分析视野更宽、更具整体性。

第四，与系统科学、复杂系统理论的边界。交易生态经济学借鉴系统思维、整体因果、结构决定功能、网络关联、反馈循环等核心思想，但并不停留在一般系统论的抽象层面，而是落脚于**经济制度运行**这一具体领域，聚焦交易活动、制度安排、摩擦结构、治理机制，是系统科学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原创性落地与范式化重构，而非简单的跨学科应用。

第五，与生态经济学的边界。生态经济学关注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强调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约束；交易生态经济学的“生态”是**交易系统的生态**，强调经济系统内部主体、关系、结构、循环的有机性、协同

性与韧性，二者在“生态思维”上相通，但研究对象、核心问题、理论指向完全不同。

综上，交易生态经济学既非既有理论的延伸，也非跨学科概念的简单拼接，而是拥有**独立研究对象、独立问题域、独立核心范畴、独立分析框架**的规范化学科分支。

（二）理论支撑

交易生态经济学建立在多学科、多层次的理论基础之上，具备深厚的学理厚度与逻辑自洽性。

第一，系统科学与整体因果观。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结构决定功能，系统状态约束个体行为，长期循环优于短期均衡——这些系统科学核心原理，构成交易生态经济学最基础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它使交易生态经济学从起点上超越个体主义、线性思维、局部均衡的传统桎梏。

第二，生态思维与协同进化理论。交易生态经济学借鉴生态系统中共生、协同、竞争、演化、平衡、韧性等思想，将经济系统视为有机生命体，强调主体共生、关系协同、结构稳定、循环顺畅、系统自我修复，为理解制度演化与系统健康提供了全新视角。

第三，网络经济学与复杂网络理论。网络结构、节点位置、联结强度、信息流动、权力分布、网络外部性等理论，为交易生态经济学分析**网络摩擦、结构失衡、平台垄断、产业链依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工具，使系统分析具备微观基础与现实穿透力。

第四，制度理论与现代治理理论。制度具有约束功能、信号功能、分配功能、稳定功能，治理强调多元主体、规则之治、系统共治、风险防控。交易生态经济学继承制度分析传统，并将其提升至**生态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高度，实现制度理论的现代升级。

第五，结构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结构主义强调深层结构对表层行为的制约作用，整体主义强调从系统出发理解个体行为。交易生态经济学将二者统一，

形成以**结构—网络—分配—循环**为骨架的整体分析范式，使制度质量判断从效率单点走向系统多维。

第六，发展经济学与高质量发展理论。发展经济学关注结构转型、长期增长、分配公平、内生动力，高质量发展强调效率、公平、安全、可持续的统一。交易生态经济学的价值目标与现代发展理论高度契合，使其具备强烈的时代性与现实解释力。

多重理论支撑使交易生态经济学既保持经济学的严谨性，又具备跨学科的开放性；既植根于制度分析传统，又实现范式性突破与创新。

（三）研究方法

交易生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实现整体主义转向，形成一套自成体系、可操作、可累积的研究方法。

第一，整体分析方法。以交易生态系统为起点，而非以孤立交易为起点；先把握系统结构、网络关系、循环机制，再分析个体行为与交易结果；强调系统约束先于个体选择，整体状态决定局部效率。

第二，结构分析方法。聚焦权力结构、垄断结构、壁垒结构、利益结构、分配结构，揭示结构失衡如何生成结构摩擦，如何影响系统公平与效率，如何决定长期演化路径。结构分析是交易生态经济学区别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标志性方法。

第三，网络分析方法。以主体间关系为基本单元，考察网络密度、中心节点、联结强度、信息流动、信任传导、风险扩散，揭示网络摩擦的生成机理与系统效应，为平台经济、产业链生态、数字经济等现代经济形态提供精准分析工具。

第四，生态分析方法。将系统视为有机整体，强调共生、协同、韧性、修复、演化，关注系统健康度、可持续性、抗风险能力，突破静态成本收益分析局限，引入长期、动态、演化视角。

第五，多维制度质量评价方法。放弃单一效率标准，采用结构健康、网络协同、分配公平、循环顺畅四维评价体系，实现制度判断从“成本高低”向“质量优劣”的转变，为制度比较、政策评估、改革方向提供客观依据。

第六，循环分析方法。以价值创造—价值交换—价值分配—价值消费—风险出清为闭环，考察循环是否顺畅、是否存在阻塞、是否存在累积性矛盾，揭示内卷、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系统性风险等深层问题的生成逻辑。

上述方法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交易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使其理论建构、现实解释、政策启示均具备严谨性、系统性与前瞻性，也为后续学术拓展与深化奠定了规范基础。

六、交易生态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分支的学理依据

一门经济理论能否被确认为独立的学科分支，不在于概念表述的新颖性，而在于是否具备**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立的核心范畴、独立的理论体系、独立的判断标准与价值目标**。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但凡能够实现范式突破、形成独立学术脉络的理论分支，无不以这四重独立性为根本标志。交易生态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超越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非对既有制度理论的修补。一门经济理论能否被确认为独立的学科分支，不在于概念表述的新颖性，而在于是否具备**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立的核心范畴、独立的理论体系、独立的判断标准与价值目标**。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但凡能够实现范式突破、形成独立学术脉络的理论分支，无不以这四重独立性为根本标志。交易生态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超越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非对既有制度理论的修补、拓展或应用延伸，而是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层面实现了系统性重构，从而完全具备成为独立经济学分支的全部学理条件。本章从四个基本规定性出发，对交易生态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予以严格论证。

（一）独立的研究对象：从交易转向交易生态系统

研究对象的独立性，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的首要前提。新制度经济学以**单次、孤立、点状的市场交易**为研究出发点与落脚点，其全部理论围绕交易行为、契约关系、产权安排、治理结构展开，本质上是对微观交易活动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这一框架中，经济系统被理解为无数交易的简单加总，结构、网络、分配、循环等整体属性被置于分析视野之外。

交易生态经济学确立了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交易生态系统**。它不再将交易视为脱离整体的原子化行为，而是将其看作主体生态、网络生态、环境生态与循环生态有机统一的系统显现。交易的发生、运行、效率与演化，均由系统结构内生决定，而非单纯由个体决策外生推动。交易生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再局限于交易成本的高低，而是拓展为系统结构是否均衡、网络关系是否协同、分配格局是否公平、价值循环是否顺畅、系统运行是否健康、长期发展是否可持续。

研究对象从“微观交易”到“系统生态”的转换，从根本上划定了交易生态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前者研究**系统运行与整体质量**，后者研究**个体交易与局部效率**；前者面向现代平台化、网络化、生态化经济形态，后者面向传统市场交换关系。二者研究对象的异质性，决定了交易生态经济学具备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

（二）独立的核心范畴：从交易成本转向生态交易摩擦成本

核心范畴是一门理论的“逻辑基因”，其独特性决定理论体系的独特性。新制度经济学的整个体系，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一核心范畴之上。交易成本将搜寻、谈判、签约、监督、执行等阻碍交易的因素统一为同质、负面、可最小化的成本，虽简化了分析逻辑，却抹杀了摩擦的异质性、结构性与价值属性，无法区分良性约束与恶性扭曲，也无法容纳结构、分配、循环等系统性问题。

交易生态经济学以原创性范畴**生态交易摩擦成本**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石。这一范畴在内涵、来源、构成与性质上，均与交易成本存在本质区别：它是结构性、网络性、分配性、循环性的**系统整体耗散**，而非微观交易层面的货币支出；它承认摩擦的**异质性**，严格区分维护秩序、保障公平的良性摩擦与垄断、寻租、掠夺的恶性摩擦；它以**系统最优**为指向，而非以绝对最小化为目标。生态交易摩擦成本由结构摩擦、网络摩擦、分配摩擦、循环摩擦四大维度构成，形成了逻辑自洽、层次清晰、可延展、可检验的概念体系。

核心范畴的根本性替换，意味着交易生态经济学拥有独立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内核”。它不是对交易成本的修正、拓展或重新包装，而是对制度运行底层逻辑的全新刻画，是具备原创性与独立性的范式性范畴。

（三）独立的理论体系：从成本—契约—效率转向结构—网络—分配—循环

理论体系的独立性，体现为一整套自洽、闭环、可累积的分析框架。新制度经济学遵循**交易成本—契约不完全—产权安排—制度效率**的线性逻辑，以效率为唯一归宿，以个体交易为分析起点，以成本最小化为核心线索。这一体系虽严密，但视野狭窄、结构单一、价值片面，难以容纳系统、结构、公平、安全、可持续等现代经济命题。

交易生态经济学构建了全新的理论骨架：**交易生态系统—生态交易摩擦成本—四维摩擦结构—多维制度质量评价—系统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其理论逻辑呈现出鲜明的整体性、结构性与动态性：以系统为本体，以生态摩擦为核心，以结构、网络、分配、循环为分析主线，以制度优良、系统健康、循环顺畅、长期可持续为理论归宿。在这一体系中，效率不再是唯一目标，而是与公平、安全、韧性、公共利益协同统一；制度不再只是降低成本的工具，而是维护系统良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框架；短期均衡不再是终点，长期循环畅通与系统自我修复才是判断制度优劣的关键。

这一理论体系，实现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式替代**，而非内部修正。它拥有独立的逻辑起点、独立的分析维度、独立的推演路径与独立的结论指向，能够独立解释重大现实问题、独立提出政策启示、独立开展学术积累，完全满足成熟理论体系的全部要求。

（四）独立的判断标准：从成本最小化转向生态最优化

判断标准的独立性，是一门学科价值立场与理论品格的集中体现。新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最小化**作为制度优劣、效率高低、制度合理与否的唯一标尺，本质上是效率至上、个体本位、短期导向的判断逻辑。这一标准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悖论：交易成本极低的制度，可能是高度垄断、分配扭曲、系统脆弱的病态制度。

交易生态经济学确立了全新的判断准则：**生态交易摩擦成本最优化**。“最优化”不等于“最小化”，其内在规定包括：降低垄断、寻租、掠夺、壁垒等恶性摩擦；保留并强化法治、监管、公平、安全、信息披露等良性摩擦；优化权力结构与网络结构，防止系统失衡；改善分配格局，提升社会整体消费能力与循环效率；保障价值循环畅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这一标准兼容效率、公平、安全、健康、公共利益等多维价值，实现了从“局部效率判断”向“整体质量判断”的跃迁。

判断标准的革新，使交易生态经济学形成了独立的价值立场：**系统本位、结构本位、长期本位、高质量发展本位**。它既超越了个体主义效率观，也超越了单一成本逻辑，与现代国家治理、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经济安全等时代目标高度契合，具备鲜明的理论自主性与时代先进性。

（五）结论：交易生态经济学是范式革命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分支

综合以上四重学理规定可以得出严格结论：交易生态经济学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扩展、改良、补充或应用延伸，而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根本性的范式革命**。它拥有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立的核心范畴、独立的理论体系与独立的判断标准，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层面均形成了自洽且严密的学术体系。

从经济学谱系看，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学从无摩擦理想世界带入真实世界，而交易生态经济学则将制度经济学从**微观交易时代**带入**系统生态时代**。前者回答“制度何以存在”，后者回答“制度何以优良”；前者构筑了传统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高峰，后者则开辟了面向现代经济、面向中国实践、面向未来发展的全新学术领域。

因此，交易生态经济学完全具备独立学科分支的全部学理依据，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具有**原创性、标志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成果。

七、范式革命：交易生态经济学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全面超越

交易生态经济学的提出，本质上是一场以系统思维替代个体思维、以生态范式替代交易范式、以多维最优替代效率唯一的深层理论革命。它不是对新制度经

济学的修补、拓展或局部修正，而是在分析单元、核心范畴、制度功能、价值标准与现实解释力等多个层面实现的整体性超越。这场范式跃迁，既植根于新制度经济学开辟的真实世界制度分析传统，又突破了其微观、点状、线性、效率至上的内在桎梏，使制度经济学真正具备理解网络化、平台化、生态化现代经济体系的理论能力。系统揭示这一范式革命的内在逻辑与多维内涵，是确立交易生态经济学独立学术地位的关键所在。

（一）分析单元超越：从“孤立交易”到“交易生态系统”

新制度经济学以**单次、孤立、点状的交易**为基本分析单元，秉持方法论个体主义立场，将复杂经济系统还原为无数交易行为的简单加总。在这一视角下，交易被视为独立于整体结构的原子化活动，制度的意义仅在于为点对点交换提供稳定预期与成本节约。这种分析框架虽然贴近新古典传统，便于进行局部均衡比较，却从根本上割裂了交易与系统、个体与整体、行为与结构之间的内生联系。现实经济中，不存在脱离产业链、供应链、社会网络、权力结构与制度环境的纯粹交易，任何交易都只是系统运行的局部显现，而非全部。

交易生态经济学将分析单元从**单点交易**提升至**交易生态系统**，实现了从局部观察到整体审视的根本转向。在这一范式下，交易不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行为，而是嵌入在主体、网络、环境与循环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之中；经济运行的核心动力不再来自个体最优决策的简单叠加，而是来自系统结构、关系联结、协同机制与反馈循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结构约束先于个体选择，系统状态决定行为空间——这一整体主义方法论，使交易生态经济学从起点上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微观局限，具备了把握系统性、结构性、长期性问题的理论能力。

（二）核心概念超越：从“交易成本”到“生态交易摩擦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核心范畴，将搜寻、谈判、签约、监督、执行、违约等一切阻碍交易的因素统一纳入成本框架，并默认所有摩擦具有同质性、负面性，应被最小化。这一处理方式虽然简化了分析逻辑，却抹杀了摩擦在来源、性质、功能与价值上的根本差异，导致理论无法对制度运行的真实结构做出精准判断。

交易生态经济学以原创性范畴**生态交易摩擦成本**替代交易成本，实现了从单一成本概念到多维系统耗散概念的升维。生态交易摩擦成本不是微观交易层面的货币化支出，而是**交易生态在结构、网络、分配、循环四个维度上的系统性阻力与整体性耗散**；它不预设所有摩擦均为负面，而是严格区分**良性摩擦与恶性摩擦、必要约束与无效扭曲**；它不追求绝对最小，而是以结构合理、网络协同、分配公平、循环顺畅为目标，追求系统层面的最优状态。这一核心概念的替换，使制度分析从“成本核算”走向“生态诊断”，从“效率计算”走向“质量评价”，为理解现代经济的深层矛盾提供了全新理论工具。

（三）制度功能超越：从“节约成本”到“系统健康”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的核心功能界定为**节约交易成本**，制度存在的全部意义在于降低交换过程中的资源耗费，提升个体交易效率。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制度的工具性价值，但也将制度简化为服务于个体交易的技术装置，忽视了制度在维护秩序、保障公平、防范风险、平衡利益、维系系统可持续等方面的根本性作用。在这一逻辑下，凡是提高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都可能被判定为低效甚至多余，极易导向弱化监管、放任市场、牺牲公平的理论偏向。

交易生态经济学对制度功能的理解更为完整与深刻：制度不仅要降低个体交易成本，更要**优化生态结构、规范网络秩序、平衡分配格局、顺畅价值循环、维护系统健康**。制度的本质是交易生态的运行规则与治理框架，其功能不仅体现在效率提升，更体现在秩序维系、公平保障、风险防控与长期可持续上。**良性摩擦**如法治监管、权利保障、信息披露、反垄断约束等，虽然可能提高局部交易成本，却能提升整个生态的稳定性、公平性与韧性。由此，制度从“降低成本的工具”升华为“系统治理的基石”，制度功能的理解实现了从局部效率向整体良序的拓展。

（四）制度判断标准超越：从“最小化”到“最优化”

新制度经济学确立了简洁而单一的制度判断标准：**制度优劣=交易成本最小化**。这一标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却也极度狭隘：它只承认效率维度的合理性，排斥公平、安全、可持续、公共利益等多维价值；它只关注交易成本的高低，不

关心结构是否均衡、分配是否正义、系统是否健康。现实中，大量交易成本极低的制度，往往伴随着高度垄断、极端压榨、分配失衡与系统脆弱，本质上是病态而非优良的制度。

交易生态经济学以**生态交易摩擦成本最优化**作为制度优劣的核心判断标准，实现了从单一效率向多维最优的范式升级。“最优化”不等于“最小化”，它包含四层内在规定：**降低垄断、寻租、掠夺等恶性摩擦；保留法治、监管、公平、安全等良性摩擦**；优化权力结构与网络关系，防止系统失衡；顺畅价值循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这一标准既承认效率的重要性，又包容公平、安全、稳定与公共利益；既否定无意义的耗散，又肯定必要的约束。它使制度判断从“是否高效”拓展为“是否优良、是否健康、是否良序、是否可持续”，真正契合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

（五）价值目标超越：从效率唯一到多维均衡

新制度经济学以**效率**为终极价值目标，将经济运行简化为成本—收益的计算过程，忽视了经济系统的社会属性、分配属性与伦理属性。在这一价值框架下，人的发展、社会公平、公共利益、经济安全、生态可持续等都只能被置于次要位置，甚至被视为效率的代价。这种单一价值逻辑，难以回应共同富裕、系统安全、高质量发展等现代国家战略目标。

交易生态经济学秉持**多维价值均衡**的立场，将效率、公平、安全、健康、可持续与公共利益统一纳入制度评价体系。效率是基础，公平是保障，安全是前提，可持续是底线，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利益是终极指向。多维价值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支撑、协同共进：缺乏公平的效率难以持续，缺乏效率的公平难以实现，缺乏安全与系统健康的经济运行随时面临崩溃风险。这种价值目标的拓展，使交易生态经济学超越了狭隘的效率主义，具备了与现代国家治理目标同频共振的理论品格。

（六）现实解释力超越：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代命题

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企业边界、契约结构、产权安排等微观制度问题上具有优势，但面对平台经济、垄断治理、产业链安全、分配极化、系统性风险、内卷

化等现代经济现象时，解释力明显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问题都是系统性、结构性、生态性问题，无法在点状交易框架内得到有效说明。

交易生态经济学凭借系统思维与生态视角，能够对上述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平台经济的本质是交易生态垄断，其矛盾来源于结构摩擦与分配摩擦；产业链卡脖子是结构依赖与循环脆弱问题；分配极化是交易生态内部非对称掠夺的结果；系统性风险源于网络联结与循环机制的失灵；内卷化是价值循环阻塞、系统修复失效的外在表现。这些问题均无法在交易成本最小化框架下得到根治，却能在生态交易摩擦成本最优化的逻辑中获得系统性解决方案。这种强大的现实解释力与治理启示力，进一步印证了交易生态经济学的范式优越性。

（七）范式总判断

综上，交易生态经济学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超越，是**分析单元、核心范畴、制度功能、判断标准、价值目标与现实解释力**的全方位、系统性、革命性超越。新制度经济学回答的是**制度何以存在**，交易生态经济学回答的是**制度何以优良**；新制度经济学是面向微观交易的效率范式，交易生态经济学是面向系统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构筑了制度经济学的过去与现在，交易生态经济学则开辟了制度经济学的未来。二者不是同一范式内的修正与补充关系，而是新旧范式之间的迭代与革命关系。这一判断，构成交易生态经济学作为独立经济学分支的最根本学理依据。

八、交易生态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与应用价值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解释现实、回应时代、指引实践。交易生态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构成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式超越，不仅源于其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学理建构，更在于它直面现代经济运行的深层矛盾，对平台化、网络化、生态化背景下涌现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穿透力与指导性。从平台经济治理、产业链安全、反垄断规制，到制度质量评价、宏观治理转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交易生态经济学均提供了超越传统效率逻辑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展现出鲜明的实践品格与时代价值。

（一）对平台经济的解释：从交易成本走向生态垄断

平台经济的崛起，是当代经济结构转型最具标志性的现象。传统制度经济学往往将平台视为降低交易成本的中介组织，认为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集中交易、信息匹配、契约简化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这一认识虽然揭示了平台的效率优势，却无法解释平台何以演化为生态控制者、规则制定者与价值分配者，更无法回应平台垄断、压榨商户、挤压劳动者、大数据杀熟、生态闭环壁垒等现实矛盾。

交易生态经济学认为，平台本质上不是简单的交易中介，而是**交易生态系统的组织者、控制者与运营者**。平台垄断并非传统的市场势力垄断，而是**生态垄断**：平台掌控主体准入、网络联结、信息流动、分配规则与循环链条，形成对整个交易生态的结构性支配。平台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并非局部交易成本问题，而是**结构摩擦、网络摩擦、分配摩擦、循环摩擦**共同作用的系统性结果。平台利用中心节点地位，抬高准入壁垒、扭曲信息结构、抽取过高租金、挤压中小经营者与劳动者收益，最终导致价值循环阻塞、社会内卷加剧、系统韧性下降。

这一解释超越了“降低交易成本”的单一叙事，为平台治理提供了全新思路：治理平台不是简单地放松管制或强化管制，而是**优化平台生态结构、规范网络秩序、校正分配失衡、畅通价值循环**，实现生态层面的系统治理。这为反垄断、互联互通、劳动者权益保障、商户利益保护等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二）对产业链安全的解释：从效率导向走向结构自主

在全球竞争与技术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产业链安全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多从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契约不完全等角度分析产业链分工效率，却难以解释“卡脖子”风险、供应链中断、外部依赖、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等非效率问题。传统逻辑强调全球分工、成本最小化，却忽视了结构自主、循环可控、系统韧性的极端重要性。

交易生态经济学将产业链视为一个**完整的交易生态系统**，产业链安全本质上是**交易生态的结构自主、网络可控、循环可持续**问题。产业链风险并非来自局部交易成本上升，而是来自结构摩擦、外部网络依赖、关键环节垄断、循环链条断

裂。一旦核心技术、关键节点、基础设施被外部掌控，整个生态就会陷入结构性失衡，效率再高也无法抵御系统性风险。

由此，交易生态经济学为产业链安全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产业链现代化不能仅追求效率最优，更要追求**结构均衡、网络自主、关键环节可控、内循环畅通**。这一逻辑将产业链安全从外部政策要求，内化为制度经济学自身的理论判断，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供了学理支持。

（三）对制度质量评价的贡献：从效率指标走向多维体系

长期以来，制度评价高度依赖交易成本、营商环境、审批效率等效率类指标，虽有操作性，但存在明显片面性：无法反映结构是否均衡、分配是否公平、网络是否透明、循环是否健康、长期是否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迫切需要一套更完整、更系统、更具前瞻性的制度质量评价体系。

交易生态经济学提出以**结构健康度、网络协同度、分配公平度、循环顺畅度**为核心的多维评价框架，实现了制度评价从“降成本”向“优生态”的升级。这一体系不再把监管、法治、公平、安全等视为效率的对立面，而是将其视为系统健康的内在组成部分；不再只关注短期交易便利度，而是兼顾长期结构性风险与可持续性。

该评价体系可直接应用于制度改革评估、营商环境优化、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区域竞争比较等现实工作，使制度评价更加全面、均衡、符合国家治理的真实目标。

（四）对宏观治理的启示：从“降成本”走向“优生态”

交易生态经济学推动宏观治理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

传统治理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政策取向往往是简化流程、放松管制、减少干预，将一切约束都视为成本。这种思路在特定阶段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导致监管缺位、垄断扩张、分配失衡、风险累积等系统性问题。

交易生态经济学提出的治理目标是**优化交易生态**：降低垄断、寻租、掠夺、壁垒等恶性摩擦；保留并强化法治监管、信息披露、公平竞争、安全审查等良性

摩擦；通过结构改革校正权力失衡，通过网络建设提升协同效率，通过分配调整畅通内循环，通过系统治理防范累积性风险。

这种治理思路更加符合新时代宏观调控逻辑：兼顾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短期增长与长期可持续，实现**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长远治理**相统一。

（五）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已经超越了以交易成本、产权界定、放松管制为核心的简单制度解释框架。平台治理、共同富裕、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命题，都需要立足中国实践、具有本土主体性、解释力更强的原创理论。

交易生态经济学以系统思维、生态思维、整体思维为基础，以**生态交易摩擦成本**为原创核心范畴，以**制度优良、系统健康、循环畅通、高质量发展**为价值指向，形成了一套既区别于西方主流制度经济学、又能够深刻解释中国制度优势与治理经验的理论范式。它不是对西方理论的应用或修正，而是从现实问题出发、从中国实践出发、从时代需求出发的**原创性、系统性、范式性**理论建构。

这一理论不仅能够为中国经济治理提供学理支撑，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具有标志性、代表性、拓展性的重要探索。

九、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立足当代经济网络化、平台化、系统化、生态化转型的时代背景，针对新制度经济学在系统视角、摩擦异质性、价值多维性与制度质量判断上的内在局限，系统提出并建构**交易生态经济学**这一新兴独立学科分支，实现了对传统制度经济学范式的整体性超越。全文以**交易生态系统**为基本分析单元，以**生态交易摩擦成本**为原创核心范畴，以**结构摩擦、网络摩擦、分配摩擦、循环摩擦**为分析骨架，以**生态交易摩擦成本最优化**为制度优劣判断标准，从理论贡献、范式超越、结构测度、学科边界、现实解释与学理依据等多个层面，完成了交易生态经济学的体系化建构。

研究表明，交易生态经济学并非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修补、拓展或应用延伸，而是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论层面均具备独立品格的范式革命。新制度经济学以孤立交易为单元、以交易成本为核心、以效率最大化为指向，回答了**制度何以存在**的问题；交易生态经济学则以系统生态为单元、以生态摩擦为核心、以高质量发展为指向，回答了**制度何以优良**的问题。前者将经济学引入真实世界，后者则将制度经济学推向系统整体、结构均衡、分配公正、循环畅通的现代治理新阶段。

本文严格论证了交易生态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合法性：拥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即交易生态系统；独立的核心范畴即生态交易摩擦成本；独立的理论体系即结构—网络—分配—循环四维分析框架；独立的判断标准即生态最优化而非成本最小化。在此基础上，交易生态经济学对平台经济、产业链安全、制度质量评价、宏观治理转型、反垄断与共同富裕等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超越传统效率逻辑的系统性解释，展现出强大的理论穿透力与实践指导性。与新制度经济学相比，交易生态经济学的突破集中体现为四个转向：**从个体交易分析转向系统生态分析**，**从同质成本概念转向异质摩擦结构**，**从效率唯一标准转向多维质量评价**，**从降低成本导向转向优化生态导向**。这一系列转向，使交易生态经济学既接续了制度经济学关注真实世界的学术传统，又突破了微观、点状、线性、短期的分析桎梏，为理解现代经济运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契合的理论基础。

作为原创性、范式性理论探索，交易生态经济学未来可在五方面持续深化：一是推进生态交易摩擦成本的量化测度与制度质量指数构建；二是面向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开展专题应用研究；三是开展历史与国际比较，揭示交易生态演化规律；四是加强与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五是立足中国实践提炼主体性理论，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坚实支撑。概言之，交易生态经济学的提出，既是对当代经济结构转型的理论回应，也是对传统制度经济学的范式超越。它以系统思维重构制度分析，以生态理念审视经济运行，以高质量发展锚定价值目标，不仅为理解现代经济提供了全新框架，也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贡献了具有原创性、标志性、前

瞻性的理论成果。随着经济实践不断演进与学术研究持续深化，交易生态经济学必将展现出更为持久的学术生命力与现实解释力。

参考文献：

- [1]Coase,R.H.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1937,4(16):386-405.
- [2]Williamson,O.E.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M].New York:Free Press,1975.
- [3]North,D.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 [4]Cheung,S.N.S.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26(1):1-21.
- [6]王振营. 交易经济学原理[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 [7]王振营. 交易经济学:交易系统演化新理论[M]. 北京:中译出版社, 2024.

Transaction Eco-Economics: A New Paradigm for Institutional Analysis in the Digital Age

Zhao Huilin

(1.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Abstract: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xplains the logic of institutional genesis with transaction costs as its core tool, evaluates institutions based on efficiency criteria, and shifts economic theory from idealized equilibrium analysis to real-world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owever, rooted in a micro-individual and linear logical analytical paradigm, it struggles to adapt to modern economic forms characterized by networking, platform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revealing evident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this paradigm cannot distinguish between benign and malignant frictions

in economic operations, focuses solely on institutional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overlooks the rationality of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distributive fairness, and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While it can justify the rationality of institutional existence, it fails to define a well-ordered institutional standard aligned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integrates systems science, holistic causality, and network analysis thinking to innovatively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ransaction ecology economics. Using the transaction ecosystem as the fundamental analytical unit, it proposes the core category of ecological transaction friction costs, which is further decomposed into four types of systemic dissipative costs: structure, network, distribution, and circul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transactions are ecologicalized behaviors embedded in diverse networks; unlike the traditional efficiency criterion of minimizing transaction costs, transaction ecology economics evaluates institutional quality by optimizing ecological transaction friction costs, pursuing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goals of systemic health, rational structure, distributive fairness, and smooth circulation, thereby offering a novel holist analytical paradigm for moder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Keywords: Transactional Ecological Economics; Ecological Transaction Friction Costs; Institutional Quality